

对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

自 津田道夫 燕子、广义译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日本右翼自由主义史观出台的社会背景,分析了司马史观与自由主义史观的本质区别,认为:司马辽太郎论证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连续性的侵略战争,战后殖民地的独立并非是日本带来的福音;自由主义史观代表人物藤冈信胜歪曲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通州事件”、“卢沟桥事变”等历史事实,宣扬“东亚战争肯定论”。司马史观也有荒谬之处,即认为日本没有攫取领土之意,而且有意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

关键词 自由主义史观 司马史观 藤冈信胜

我在《增刊·人权与教育》(日本社会评论社发行)26号上以《对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代表藤冈信胜的“随军慰安妇”问题的理解度》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慰安妇”一词,自从4月份在中学社会、历史教科书中出现以来,藤冈信胜对教科书的歇斯底里的攻击越发引人注目。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研讨“自由主义史观”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现就这一问题论述如下。

一 “自由主义史观”出台的思想史背景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于1995年7月。1996年6月,关

* 原文发表于日本《人权与教育》月刊,日本社会评论社和实现残疾者教育权利会
1997年11月15日发行。

于“慰安妇”的记载同时出现在将于1997年度开始使用的中学社会、历史教科书中。与此相对抗，“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于1996年12月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代表是西尾干二，副代表就是藤冈信胜。尽管西尾和藤冈各自研究的领域多少有些不同，但至少在批判现行教科书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因此我将这两人同样当作批判对象。

那么藤冈到底坚持什么主张呢？他认为迄今为止的现代史教科书是以“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为蓝本的“骇人听闻的黑暗史观、自虐史观、反日史观的全盘登台亮相”。换言之，是基于美国的利害关系上推出的东京审判史观，顺应苏联的利害关系的共产国际史观。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正是在上述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藤冈标榜从不受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先入观的束缚，要站在纯自由的立场上大胆地重新认识历史。但是，所谓的“不受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影响的纯自由的立场”本身正是一种意识形成论。在论及“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自由”时，正已被另一种意识形成所浸透，这该是意识形态论的常识吧。例如，将学术论争的对手贬为“反日历史学家”、“反日包围阵线”。西尾干二在《新历史教科书战争》一文中说：“日本存在着拚命贬低中伤自己国家的日本人间谍团。”（该文收入《新日本历史的开端》）也就是说，以前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们全是“日本人间谍团”。这种歇斯底里地乱贴标签的本身，正好让人们对其思想体系、意识形成一目了然。

接下来，看一下所谓“重新认识历史教育”的观点的政治背景，这样才能洞若观火。1993年自民党一党支配日本政局体系崩溃，当年8月9日细川护熙内阁成立。在记者招待会上，细川首相就“东亚战争”作了“我认为这是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的发言。对此发言，自民党系的反动官僚、反动议员深感危机，于是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接连出笼。例如，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于1994年5月，环

境厅长官櫻井新于 1994 年 8 月,文部大臣島村宜伸于 1995 年 8 月,总务厅长江藤隆美于 1995 年 10 月,都分别指责细川的发言是反动性的失言。

与此并行的是 1993 年 8 月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成立。1996 年 8 月“历史研究委员会”推出的《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日本辗转社出版)是其代表性言论。1995 年 2 月,新进党结成“传授正确历史”国会议员联盟”,1996 年 6 月,自民党又结成“明朗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以上无论哪一个团体都是从保守政党的角度开始所谓“重新认识历史”的。

1995 年日本战败 50 周年前夕,当“战争谢罪议案”已提上国会讨论日程之时,反对“战争谢罪议案”的意见书却相继被地方自治体所采纳,即由右翼煽动的国民运动所支配的地方自治体提出了反对“战争谢罪议案”意见书。这绝不是孤立的行动,与其遥相呼应的是作为传播媒介的营业战略,开展了所谓“重新认识历史”的宣传活动。比如 1997 年 1 月 7 日,产经新闻社召开“新年职员大会”,羽佐间重彰董事长在大会上发表新年贺词时提出,《产经新闻》要向发行量 200 万份挑战,攻击教科书的宣传活动是扩大发行量的营业战略之一。于是,“产经营业战略”的奏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立,一些自民党、新进党议员在国会的活动,消除教科书中有关“随军慰安妇”记述的运动开始了。

紧随《产经新闻》的发难,小学馆的《APIO》以“并非自画自赞”为题展开了议论,文艺春秋的《诸君》、德间书店的《サンサー》杂志也就教科书问题、随军慰安妇问题不惜版面发表意见。现在以上问题已经以“一种社会现象”为题提出讨论。与保守政党 50 年代的第一次攻击教科书和 80 年代第二次攻击教科书相比较,这次作为全社会问题被提出。从政党、国会到一般庶民,已作为一个大众思想运动展开了,即一部分是右翼的政治家、右翼势力,另一

部分是维持现状、随波逐流的保守思想的普通民众,运用所谓“人民主义”的手法,部分地形成了右翼群体。

依我个人经验而言,大约4年前,我回母亲的娘家时,遇到了比我年长15岁的表兄。表兄曾去过“满洲”,当言及此事时,他公然感叹道:“当时的满洲,匪贼出没,可不得了啦!”不用说,“匪贼”指的是当时的抗日游击队,但“匪贼”二字已成为普通庶民叹气的日常用语了。这是战后贯穿在维持现状的普通民众间的一种潜在意识。从中可以窥见所谓“人民主义”的表现形式或反动群体的悄然形成。其背景是日本经济高度成长以后日本人的“自信”。例如,无论是资本家、富人们,还是一般大众,去海外都能凭坚挺的日元买到便宜货。这里便酝酿着漠视一切的大日本国论。日本人战败后已有的类似的感情以及其他心态的混合,可以说导致了对于战争问题的认识的变化,渐渐形成了右翼大众群体。此外,追随并鼓吹“变革”战争认识论的以《产经新闻》为中心的营业战略,也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

二 藤冈信胜对于历史事实的误认和歪曲

藤冈信胜对于历史事实的误认颇引人注目,即不是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而是在历史事实方面大搞欺骗花招。例如,在藤冈看来,世界上无论哪国都存在军队慰安妇,并非只有日本“创建”慰安所;如果欲将慰安妇问题、慰安所问题编入教科书,那么不论及其他国家的军队慰安妇问题,岂不是要失去国际平衡吗?他在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的某一部分以补充说明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论述:“以麦克阿瑟为司令官的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日本政府发出指令,实行了占领政策。首先命令日本政府为占领军设置慰安所。”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藤冈的补笔。但是,这完全是违背事实真相

的谎言。为占领军设置慰安所，是日本方面的率先行动。1945年8月18日，即战败后仅仅3天，内务省警保局长发出通知，把《〈国驻屯军慰安设施等整備纲要〉》传达给各个警察署。8月26日，根据《纲要》成立了特殊慰安协会(RAA)，面向一部分日本女性表达了下列意图：“告新日本女性：作为处理战后国家的紧急设施的部分，诚征率先协力参加进驻军慰安大事业的新日本女性。”由于当时日本处于粮食困难的非常时期，而有关《公告》中又声明“保证衣食住行”，因此非常具有吸引力，一部分女性参加了应征。这是日本兵在中国战场上大强奸的再版，日本侵略军作为对付强奸的对策而设立慰安所的创意与日本政府对待美国占领军的对策同出一辙。这是日本内务省率先行动的事实。内务省的这一创意与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置慰安所的主意完全一致。但是藤冈却胡说设置慰安所最初是麦克阿瑟的命令。这是稍稍翻阅一下战后历史就明白的事实。藤冈却以重叠错误事实的形式在《国民的疏忽》一文中说什么“事实上美军占领日本时，美军自身首先向日本方面提出了需要这样的设施的要求”。这种慰安设施根据1946年1月盟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被解散，理由是日本的公娼设施违背民主的理想”，而又一个不愿公开的理由是美军中性病的流传。这个经过是谁都明白的事实。

关于历史事实的误认上，一般来说应有商榷、再证的余地。我本人有时也会犯此错误。只是藤冈的特征是以误认的事实作为论战的观点并且强加于人。此类历史事实的误认比比皆是。再举一例。藤冈自称于1962年大学入学后加入了日本共产党系的民青组织，在民青的研究会里阅读了《斯大林党史》，也就是国民文库出版的《苏联联邦共产党史》，两党史一致。《斯大林党史》是1938年在斯大林的直接指导下，根据《苏联同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小教程》为蓝本制订的；1965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

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该书不再通行。而国民文库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是赫鲁晓夫时代的版本。对这样的事实误认,藤冈居然也满不在乎。

此外,藤冈对于一件件历史事实的歪曲,也令人注目。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教科书中没记载的历史》第2卷中关于通州事件的叙述。通州事件是指1937年7月29日在北京郊外的通州中国军队杀害日本人的事件。通州在1935年成立了日本傀儡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那里驻扎了亲日派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军队,因此日军在通州随心所欲地调遣军队和演习。卢沟桥事变后,由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亲日的保安队暴动,杀死了日本人300多人中的200多人。当时日本新闻媒体以“报仇雪恨”为口号,煽动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但在《教科书中没记载的历史》第2卷中却是这样描述的:“自中战争的起因是通州大屠杀事件。”当时通州驻扎着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是1900年日军借义和团事件出兵中国以后得到的驻兵权,其本身就是侵略行为。通州也驻扎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军队,但是这些被认为是亲日的军队却出乎意料地反叛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军。这是因为1935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从傀儡的满洲国无关税地运来了鸦片等贸易商品并且渗透中原大地,中国人民意识到民族灭亡的危机。1935年以后抗日运动高涨,特别是北京大学掀起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连日本傀儡军队里也渐渐渗透了抗日意识。众所周知,在通州事件之前的7月7日,日军即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藤冈以通州事件作为日中战争的导火线,完全是抵赖和找碴儿,与当时的军部同出一辙。这一类以历史事实的误认和歪曲为依据的堂而皇之的争辩,在藤冈的论调中随处可见。

三 司马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

(一) 明治时期与昭和战争前期政体对立的史观

藤冈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司马史观是将明治国家理想化, 称颂为“光明的明治国家”或者“成功的明治国家”。司马辽太郎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斜坡上的云》写作于日本 60 年代经济高度成长的末期, 1969 年作为单行本发行。《斜坡上的云》以日俄战争中的活跃人物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兄弟为主人公及他们周围的配角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等人为点缀, 讲叙了日俄战争全貌的故事, 作为娱乐消遣的小说, 在一定程度上很有趣。但是司马氏在这里忽略了如何对待近邻弱小民族的视点, 一味讴歌“光明的明治”, 正符合当时仰望“斜坡上的云”的日本人的心理, 同时也潜伏着对于俄国人围绕朝鲜半岛争端的恐怖感。日本人对于俄国从旧满洲到朝鲜的势力延伸的恐怖感, 正好使国家与个人一体化, 即国家与个人共命运。因此依明治的状况, 可以说日俄战争是祖国的防卫战争。”司马辽太郎在他撰写的《国家的形式》一书中如是说。

《斜坡上的云》为什么在工薪阶层如此受欢迎, 其理由是: 经济高度成长的结果, 不是军事上的秋山好古、秋山真之等武士, 而是经济上的秋山好古、秋山真之等武士应运而生。也就是说, 战败后一度消沉的日本大众的潜意识中希望日本复归大国的愿望又重新点燃, 再一次形成了日本大众的大国日本意识。于是引发、刺激这种大国日本意识燃烧的《斜坡上的云》就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部资本家、有产阶级的大众小说带有浓厚的阶级性。

司马氏将明治国家与昭和时代相比, 认为战前昭和时代是日本史中的“非连续时代”, 或者称为“异胎的时代”。他说: “明治宪法与今天的宪法相同, 明确地确立了三权分立, 但到了昭和时代就变

了质,从统帅权逐渐独立开始,终于一种万能的权力凌驾于三权分立之上,而统帅权的管掌者在参谋本部,事实上参谋本部不是‘参谋’,而是拥有‘所有’权。顺便附带一句,在宪法上天皇无国政、统帅等执行责任。”(《国家的形式》第4卷)事实果真如此吗?昭和战争悲剧的根源是战前统帅权成了国家的最高指挥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明治宪法真的像司马氏说的那么好,而到了昭和时代才恶性变质的吗?

笔者重新温习了明治宪法,但是无论如何找不出明治宪法与现行日本宪法规定的一样的三权分立。明治宪法第一章第四条里记载“天皇为国家的元首,具有总揽统治权”,第十一条里记载“天皇为陆海军统帅”,第十二条里记载“天皇具有陆海军的编成以及常备兵兵额的规定权”。而这些内容在现行日本宪法第一章关于“天皇”的规定中均为禁止条款。明治宪法明文记载天皇可以统帅陆海军队,这里的“统帅”,是将宪法以外的诸事项,甚至议会、内阁不能插手的事项,直属天皇管辖之意。但司马氏却认为明治时代因为有杰出的元勋政治家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并依靠他们的政治力量,取得了政治上三权分立的平衡,其结局是明治国家的蓬勃发展。这真可谓极端的个人历史观、指导者历史观。细读他的《斜坡上的云》这种历史观明晰可见。但是笔者反对这种历史观。战前昭和的天皇制的军阀独裁(笔者不得不使用这样的语言),追根溯源是在以明治时代为基础的近代国家体制中孕育的怪胎。统帅权从国家的其他权力机关中独立而直属天皇这件事,只要看看明治宪法、军人敕諭(天皇对军人下的告諭)等公开文件就可以一目了然。而对于关键的这一点不去直视、追究,却高唱明治时代的蓬勃发展是因为有伊藤、山县等英明指导者正确掌握了国家诸权力机关间的平衡。这不是个人英雄史观又是什么呢?

(二)司马氏的十五年战争史观

下面看看司马辽太郎十五年战争史观是什么样的历史观。

从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事件为导火索的“满洲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的15年日中战争称为“十五年战争”。“十五年战争”称法的提案者是鹤见俊辅氏。那么司马氏怎样看待十五年战争呢？

“昭和初年的疯狂是由昭和六年(1931年)关东军的一部分参谋挑起的满洲事变引发的。”

“‘满洲国’成立(1932年)后,为了再在长城线内的华北五省成立‘满洲国’似的政权(1935年),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憎恨与反感(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抗日运动及1936年的绥远事件等),日中战争终于全面扩大了。”

“当然,‘大东亚共荣圈’是虚其美名。”

“南京进出作战——大东亚战争作战构想——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取(在中国)继续战争不可欠缺的石油。如曾取得马来西亚婆罗洲等的石油,以其作为圆规的中心描绘出的石油地带成为了广大的作战地域。又如菲律宾是美国的要塞,日军为坚守石油产地而发起攻击。当然也包括英国的军港新加坡。此外,必须保住周围的新几内亚、爪哇,又向塞班岛派兵。这些总称为大东亚共荣圈。”

“那次战争给许多民族带来了灾难,可以说没有夺取领土的打算与计划,而是由于以上陈述的理由而发动了侵略战争。即使说那次战争的结果触发了战后的东南亚诸国的独立运动,但是作战的本意如上所述是为了获得石油,为石油地的防卫而对周边的英美军事要塞发动了攻击,并设置了军事据点。如果真的有圣人似的解放殖民地的思想,首先必须解放朝鲜、台湾。”(以上均引自《國家的形式》第4卷)

司马辽太郎对于十五年战争史的评价,其正确的观点可以归纳为:关于前后长达15年的战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但终归是一

次连续性的侵略战争；对于中国的侵略，使日本完全陷入“东亚战争”的泥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的殖民地相继独立，并非是日本带来的福音，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其错误的观点，留待后面第四节批判。

(三)关于藤冈信胜的十五年战争史观的批判

藤冈与司马氏关于十五年战争的认识存在本质的区别。藤冈这样说：“‘十五年战争’史观根本不符合事实。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满洲事变与支那事变之间存在一个和平时期。塘沽协定默认了满洲事变。卢沟桥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说是共产国际为了作为国际战略的一环将日本无端地强拉硬拽入战争而引发的。”（藤冈信胜著《国民的疏忽》）

关于“东亚战争”，藤冈如此展开了其高见：“美国为参加欧洲战场战争寻找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希特勒挑衅，向德国的船只寻事攻击，然后等待对方的还击。欲助其盟友英国而寻找参战的理由，是罗斯福的作战策略。然而希特勒政治上十分狡猾，并且具有敏捷的判断力，没有上罗斯福的挑衅的当。不得已，美国又来挑衅日本，以向日本宣战，从而向日本的同盟国德国宣战为形式，试图从幕后走出来参加欧战。美国的意图显而易见，是将两个地区不同、性质不同的战争拴结在一起，成为一次世界大战。”（《国民的疏忽》）

笔者认为将“满洲事变”与“支那事变”割裂，并说这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和平的时期”，这真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塘沽协定确实是1933年缔结的，虽说中国暂时默认了日本支配满洲，但是日本参谋本部仍然研究并推进了战争方案。从《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应答录》中可见，河边少将这样说：“实际上，支那事变’是满洲事变’的依然和继续。”这就是说，塘沽协定约定华北的中国军和日本关东军之间停战，似乎“满洲事变”以来日中敌对关系已经化结，日

本方面将“满洲国”既成事实化的野心得到满足。实际上,尽管结成了塘沽协定,中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并没有局限于停战条约而一直坚持抗日的立场,从1936年9月到12月,日中两国的交涉以川越——张群会谈的形式在进行,有关“满洲事变”的交涉事实上仍在继续。正因为如此,日本军部基于“华北自治”的构想,准备在华北建立一个“满洲国”式的傀儡政府。1935年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它成为“满洲国”与中国本部之间的缓冲地带。虽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但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本身便是“满洲事变”的继续——战争行为的继续,这是连在战争中活跃在军队中枢的河边虎四郎都承认的事实。藤冈的十五年战争史观完全无视日本参谋本部的策划和推动,无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将日中全面战争的原因归结于共产国际的阴谋,这完全是无耻的捏造。

藤冈完全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将日中战争与1941年12月8日开始的“大东亚战争”割裂开来,并说美国为了介入欧洲战场而挑衅日本,将日本强拽入战争漩涡,其目的是诱导日本的同盟国德国最终也卷入战争漩涡。藤冈完全无视“大东亚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对中国的侵略,借口“美国的挑衅”、“美国的意图”,这与前面介绍的司马氏的立场有着本质的不同。西尾干二说他自己对“大东亚战争”“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座谈会“超越自虐史观”),但是我不得不说藤冈、西尾之流实质上是持“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

评论家高泽秀次在《战后历史教育与教科书——围绕“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一文中公然激励藤冈信胜:“翻遍《教科书中没有记载的历史》,没有将美国、前苏联描写成大坏蛋、反面角色,没有美化日本,但是其中揭示了美苏的野心和阴谋,因此日本在亚洲的防御战略是正当的。藤冈及其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现在更加不必忌惮和惧怕什么。他们的具有鲜明特色

的历史观对败战后五十年国际流行的谬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笔者作为‘战后世代’的普通一员,对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期待是:“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压抑的‘东亚战争肯定论’,通过他们的毫无遮掩的大胆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历史。”(《サシ一ウ》1997年2月号)与之遥相呼应的藤冈立即对高泽的“高论”以《重要记事》为题在《现代教育科学》上做了介绍和评论。

以上是笔者围绕藤冈的十五年史观的真实面目的几点看法。

(四) 再论司马辽太郎的十五年战争史观

如前所述,司马氏一贯坚持十五年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必须注意他的“可以说日本当初并无掠夺领土之意”。日本当初真的并无掠夺领土之意吗?司马氏强调侵略战争的特征是石油问题,而不是合并占领地和攫取外国疆土。

1941年12月11日本占领了美属威克岛,认识到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之后,立即宣布对该岛的占有权,并将其命名为“鸟岛”。1942年2月15日迫使新加坡的英军投降之后,17日将该岛改名为“昭南岛”,作为军政要地。这样的事实,司马氏不会不知道吧。1943年5月29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络会议确定的《东亚战略指导大纲》中有更加令人吃惊的文句:“马来、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塞勒贝斯已被决定成为帝国领土,并作为重要资源的供应而极力开发,要把握住当地民众的民心。”这份极密文件,我是在战后《现代史资料》(みすず书房)中看到的,决非司马氏所说的“当初并无掠夺领土之意”。这只能说明司马氏的十五年战争史观具有根本性的瑕疵。

此外,论及十五年战争时,司马氏回避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司马氏评价明治宪法时强调天皇没有政治上统帅权上的责任。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天皇无论如何不能逃避战争责任。

60年代以后,《户幸一日记》(木户幸一原为内大臣)、《庄

日记》(本庄原为侍从武官长)、《影山日记》(杉山原为陆军参谋总长)等逐渐被公开,70年代《东京审判资料·木户幸一询问调查书》被公开。这些历史资料都明确地记载了天皇裕仁具有高度的军事知识,并直接指导了战争。例如天皇介入了内阁的军事大臣的人事安排。从1939年8月30日到1940年1月16日,虽为阿部信行大将组阁,但是天皇介入阿部组阁的陆军大臣的人事任命,命令由畑俊六或梅津美治郎任陆军大臣。更为有名的是,1928年关东军的河本大作制造了爆炸谋杀张作霖事件,天皇欲对违反军纪的河本追究责任,但当时的首相田中义一认为如果通过军事审判追究河本的责任,将连累其他军人。田中首相向天皇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于是昭和天皇以“君违反了与我的约束,引咎辞职吧”,一句话解散了田中内阁。谁说天皇在政治上统帅权上毫无责任呢,这不明显摆着违反事实真相吗?

1991年,战前曾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寺崎英成记录的《天皇独白录》被发现、公开,其中记载了天皇在战败之后不久的1946年上半年的一些言论:“我当时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理由:第一,如果拒不接受,继续抵抗,我将不能保护我的子民;第二,关于国体保护,木户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敌军如果从伊势湾附近登陆,那么伊势、热田两神宫将立即被压制在敌军势力之下,连从容转移神器的余地都没有。”天皇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天皇制独裁的“国体”。这决非是站在日本大众立场的考虑。

此外,关于满洲事变,天皇曾发表以下言论:“如果陆军的意见与我相同的话,我曾想与近卫面谈之后,让其与蒋介石妥协。这是因为满洲地处较偏的农村,即便发生了不寻常事件,也不成什么大问题。如果发生在天津、北京,就会受到英美等列强的干涉,恐怕会引起与英美的冲突。”意即事变发生在满洲没有关系,如果发生在天津、北京就有点糟糕了。这里所表现的明显的特征是,天皇对中

国人毫无半点负罪感。

关于冲绳战,天皇有如下说法(不知冲绳人读了之后做何感想):“本来陆军已延长了决战时机,可惜海军自暴自弃,率先打决战,造成陆海军作战方针不一致,真是愚蠢至极的战斗。最后的决战失败了,无条件投降也是迫不得已。”众所周知,在冲绳之战中,冲绳居民四人中就有一人被杀,其中有的被美军所杀,但更多的是被日军所杀。天皇在此明目张胆地单纯从战略方针上认为“真是愚蠢至极的战斗”,这表明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冲绳人民的战争责任问题,天皇毫无认识。

司马辽太郎对此视而不见,只能说明他的历史观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笔者认为,司马氏在执笔写作《国家的形式》之际,不应该不知道《天皇独白录》。如果真的不知道,那么司马氏对情报、资料、时势就相当生疏、缺乏了。不,司马氏不会不知道,而是故意不愿触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司马氏的十五年战争史观的问题:一是胡说日军当初并无掠夺、攫取南方地域领土之意;二是有意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尽管如此,与以司马氏为样本的藤冈信胜相比,藤冈的十五年战争观与司马氏的十五年战争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落差。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津田道夫,1929年生,日本记者、评论家)

(责任编辑:刘兵)